

· 专题研究 ·

南非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及其思想主张*

[南非] 柯瑞科·海里克 [南非] 彼得·威尔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南非人民夺取自由的重要理论武器。在南非，得益于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迎来了繁荣，并出现了社会历史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两个基本派别。然而，随着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府转型、冷战思维的影响、国家理论的论战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力量逐渐衰微，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南非化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如今问题重重的南非，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好地发挥作用，因而，厘清南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就显得很有必要。这种历史与现状在对南非社会历史状况和诸多研究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得以本真的展示，这一展示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适合南非的新人道主义的一种探寻。

关键词 南非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社会转型 政治自治

作者简介 柯瑞科·海里克 (Kirk Helliker)，南非罗德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彼得·威尔 (Peter Vale)，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马克思主义欲在南非问题的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让我们共同期待它以一种开化而非守旧、对话而非狭隘教条的方式存在。^①

——弗雷德里克·约翰斯通

* 本文经彼得·威尔教授授权发表，翻译过程中对标题、内容摘要和参考文献作了一定修改，但并不代表译者的观点。See Kirk Helliker & Peter Vale, "Marxisms Past and Present", *Thesis Eleven*, Vol. 115, No. 1, 2013, pp. 25-42.

① Johnstone F, "The labour Histor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the Context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 and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School", *Social Dynamics*, Issue 4, No. 2, 1978, p. 108.

南非马克思主义的崛起

弗雷德里克·约翰斯通 (Frederick Johnstone) 在《阶级、种族和黄金》(Class, Race and Gold, 1976) 出版两年后, 在书上添加了上述警句。在批判“自由学派”——统治着南非研究领域, 且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的阵营中, 他与其他南非学者(这些学者多为流亡者或移居者, 大多都寓居英格兰) 达成了共识。自由派一方面宣扬种族统治有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成长将会终结种族的统治, 继而极大地推动社会变革。与之相对, “新学派”(如约翰斯通所言) 则辩称种族统治在一定时期内对资本主义有促进作用。

(一) 南非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本派别: 社会历史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

同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划界一样, 南非马克思主义也有两个派别^①——社会历史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前者源于南非金山大学的历史研究会和伦敦的联邦会, 他们受到汤普森 (E. P. Thompson) 和英国经验传统的影响——强调机构重于结构, 借助于它们对大众阶层的切身体验和对斗争的敏感性, 而希望自下而上地重构南非历史; 后者受到结构主义传统和尼科·布朗扎 (Nicos Poulantzas) 的影响, 常会囿于阶级、国家和权利等诸多问题的论争——这一问题深受三位史学“前辈”的赞赏, 也影响着“四大金刚”的著述。^②

关于“本土正统化”, 社会学家比琳达·柏瑞丽 (Belinda Bozzoli) 表现出了一丝忧虑: 南非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粗暴地接受了作为舶来品的“北方理论”, 然而, 南非的现实则被“削足适履”了。易言之, 在此情况下, 南非社会的最大特色——由众多种族主体构成的社会结构, 会渐渐地被按照社会功能来划分的阶级所替代。在她看来, 南非马克思主义并非诞生于南非, 而是北方。所以, 她宣称“南非的现实能够向这个理性世界表明什么问题被

^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建的理论形态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在南非就已经存在, 但直到 80 年代, 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出现于南非的科研机构中。

^② 三位史学“前辈”是: 哈罗德·沃尔普 (Harold Wolpe)、弗雷德里克·约翰斯通和马丁·里格斯科 (Martin Legass); “四大金刚”则是: 迈克尔·莫瑞斯 (Michael Morris)、单·奥·梅瑞 (Dan O'Meara)、戴夫·卡福兰 (Dave Kaplan) 和邓肯·英尼斯 (Duncan Innes)。——译者注

逐渐抛至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何谓南非的现实这一问题。”^①

尽管如此，在1968年事件后西欧重新兴起的激进思潮与行动主义推动下，南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迎来了繁荣，并统领着许多的大学（主要是在南非的白人聚居区中讲英语的大学中）学科。用约翰斯通的话来说，南非马克思主义当即被分为“开化派”和“守旧派”，后者深受流亡的南非共产党（SACP）所拥护，他们并不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南非马克思主义崛起的动因：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

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是推动南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驾“马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的“两歧”被逐渐消解。这一现象既在70年代的南非，尤其是德班和约翰内斯堡的反种族歧视贸易联盟的运动（主要是黑人，部分白人知识分子也表现得异常活跃）中得到鲜活地验证；又在发端于80年代的联合民主阵线（UDF，有时亦被称为“流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内派系”）中得到确证。

社会学家阿里·西塔斯（Ari Sitas）在反思这些“峥嵘岁月”时说道：激进的知识分子自始至终都是在学科系统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70年代早期以来，具有一定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的白人和黑人左翼知识分子把控着一定的社会话语权，他们有足够的文化实力来推进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他们以平等主义的主张使解放叙事深具活力。^②

按照西塔斯的说法，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包括白人大学教员和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黑人知识分子——主要是与比科^③领导的黑人觉醒运动（BCM）有关的知识分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有关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出入于罗本岛），以及年轻一代的贸易联盟成员。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动荡和斗争不断的情境中扎根的。有鉴于此，安德鲁·纳什（Andrew Nash）辩称：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南非化的“特殊性”……“而非其理念，真正影响到南非人民”，他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南非化”^④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① Bozzoli B. , “Challenging Local Orthodoxies”, *Social Dynamics*, Issue 6, No. 2, 1981, p. 54.

② Sitas A. , “The Waning of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Society in Transition*, 1 (1-4), 1997, p. 13.

③ 斯蒂夫·比科（Steve Biko, 1942—1977）是南非政治活动家和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他在1977年8月被种族隔离者的秘密警察暗杀身亡。

④ Nash A. , “The Moment of Western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19, No. 1, 1999, p. 66-67.

历史社会学家的理论逐渐被人熟知,这有赖于各种专题讨论会的召开和专著的出版,此外,亦少不了返回南非执教的毕业生的功劳。他们的观点深受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①和南非索韦托起义^②影响的激进学生、学者的赞同。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南非各高校取得“重大进展”,颇受理论界的热议。

(三) 南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与分歧

尽管“常规科学”具有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带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解放事业,继而成为一种(超学术的)理论形态。社会学家席琳·艾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黑人觉醒运动(BCM)和反种族歧视黑人贸易联盟相联系,得出一个宽泛而又极具批判性的结论:南非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思”,是“各种让它与权力牵涉甚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较量的结果”。^③显然,这一论说与南非现实并不相符。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黑人觉醒运动在理论上强调种族重于阶级,在实践中也极力排斥白人。在艾利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和客观真理并不会对白人知识分子产生十足的吸引力,它致力于构筑一种让白人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强调阶级重于种族,以便凸显其政治地位。

新兴的、持非种族歧视立场的黑人贸易联盟运动似乎使得阶级分析理论变得易于接受。这并非妄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黑人贸易联盟中大多数掌权的职位都被白人马克思主义者所占据。这种情况是否显示着对黑人知识分子的排挤?沙赫拉·布兰谷(Sakhela Buhlungu)等社会学家不禁会对此产生质疑。约翰·马里(Johan Maree)以白人对民主联盟体系建立的重大贡献来做回应。然而,对于艾利来说,白人知识分子的理论(积极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领导激进的政治运动)活动是特定的学术和政治运动所必需的。

然而,大学知识分子与组成解放运动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有

^① 1968年5月,基于欧洲各国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武装干涉之动因,法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以集会、示威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生运动。——译者注

^② 1976年6月,索韦托(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小镇)的学生发动起义,抗议关于强制使用布尔语(南非荷兰语)授课的裁定。

^③ Ally S., “Oppositional Intellectualism as Reflection, not Rejection, of Power: Wits Sociology, 1975 - 198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13 - 16 August, pp. 2, 5.

些知识分子直接在组织内工作，还有一些虽然享有较大的学术自主性，但依旧和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诸多的分歧也就由之产生，继而在联盟内部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间产生了不同的派系。非洲人国民大会（托洛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里格斯科在被驱逐的时候与他人共同建立的；“工人主义派”与“平民主义派”也在反种族歧视贸易联盟内产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间还有更深层的争论，其议题包括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社会转型的“一步”和“两步”理论等等。

南非马克思主义的衰落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行将就木，但南非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却不曾休止。在此情势之下，国家的未来仿佛受制于两股亲近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一是由贸易联盟运动所推动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洪流；二是借助于整个 80 年代不断增强的联合民主阵线的地方分支机构的力量，它们已经在城市的黑人聚居区建立了街道基层组织（称为街道办^①）。如若不能实现，这些因素本身也至少暗示着这样的可能，即一种对抗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一系列双重权力的机构，它们本身就预设了后种族隔离时代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当然，在社会转型成为当务之急的后种族隔离时代，这是确定无疑的；另外，雅尔塔体系虽已坍塌，但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使然，人们乐意构想一个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国家——追求基本的民主，致力于矫正历史积弊。

（一）现实根源：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转型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府由奉行民粹主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它的盟友（南非共产党和南非贸易联盟代表大会）共同执掌。固然，这样的政府也会有社会再分配的计划，但也逃脱不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的窠臼。这些自上而下的计划终也难免会为技术官僚所把控，继而也难对平民阶层负责。因此，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就必须落实到社会变革的目标上来。围绕着国有化的几次论战，充分暴露了政府的不力。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激进的变革势必会让国家难以承受。政府虽也承诺取消一些明显具有种族隔离色彩的

^① 这些“街道办”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联合民主阵线在城市社区建立的，仿效更早一些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模式。这些“街道办”的目的是训练、控制并政治动员地方社区。

政策，并试图将南非引向国际经济体一体化的道路，但是这未能改写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

虽然，种族分离和种族隔离^①在南非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确实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在其著述中指出种族统治阻碍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需要^②。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撰写的《种族、阶级和隔离国家》（*Race, Class and the Apartheid State*, 1988）一书即以此观点为基础。在书中，作者提出两点论断。其一，深受种族统治的影响，新建的资本主义社会依旧矛盾重重；其二，受到其他条件的影响，种族隔离与资本经济之间呈现出非结构性的关系。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新生物生长的必要条件。这对南非马克思主义而言亦如此，无种族统治的社会环境将会极大地促成其枝繁叶茂。同时，这一诠释包含着这样一种暗示，反种族统治的斗争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一思想对后种族统治时代的南非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的矛盾和危机似乎说明南非资本主义与非种族化的状况相适应了，并逐渐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

在“转型岁月”（1990~1994年）期间，一些极富群众基础且战斗在都市最前线的社区组织都相继解散，此即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的阶级运动，抑或说，是所谓的“阶级依偎”和“精英转型”。很难说，这是一种蓄意的策略，但结果很明显——支持者（非国大）占尽便宜。平心而论，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任何一种主张都没能为以建立新社会为目标的国家转型提供严肃而可行的道路。

不仅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了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南非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如此。安德鲁·纳什（Andrew Nash）争辩道：“整整一代的知识精英毫无例外地纷纷向市场需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屈服”^③。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人都放弃了激进的社会实践。托洛茨基主义者小团体的存在就是很好的例证，

① 种族分离（Segregation）和种族隔离（Apartheid）并非同一概念，它们在指称上是有区别的。种族分离指自发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思想与实践，在南非，种族分离自从欧洲人进入之时就开始存在，典型的事件如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该法案规定白人拥有87%的土地。而种族隔离则特指1948年至1994年间由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政府推动的以法律形式存在并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法案和实践。——译者注

② Fine R, “The Antinomies of Neo-Marxism”, *Transformation*, Vol. 11, 1990, pp. 92-103; Saul J and Gelb S., *The Crisis in South Africa: Class Defense, Class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③ Nash A, *op. cit.*, p. 66.

这其中包括已为读者所熟知的里格斯科，他仍积极从事社会运动。年轻一代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熏陶，以至于他们的行动既不以市场调节、又不以政府调控为导向，而对非政府的市民社会或大众抗争情有独钟。

无疑，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遭受挫折，使得南非新生代思想家们纷纷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在这一点上，南非与其他地区并无不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近年来南非弥漫着“一系列毫无生气的社会学产品”，而在最关键的“转型与解放的议题”上则是一片空白。诚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所言，在“迷失”的十年（90年代）里，只有印度学者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二）理论原因：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衰微

诚如南非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有其本土渊源一般，其衰退亦然。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3年之后，西塔斯悲观地宣称社会学的力量，尤其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批判的力量“正在衰退”。对此，我们必须追问：西塔斯言外之意是指社会学家的力量衰退，还是社会学的力量在衰退？因为7年之后，西塔斯自己承认，“我们（南非社会学家）正在构筑自己的心理障碍”，“更广层面的社会-伦理的承诺也将开始坍塌”^①。因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时候，社会学家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原则都在衰退。这显然对南非激进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指出，个人和政治上的悲观情绪常会导致理论上的修正，甚至是倒退，继而会影响到思想和行动。2002年，甚至连里格斯科（在西开普大学演讲）也实事求是地说道：“目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不是书写历史的主要方式，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把它们作为主要的书写方式”。^②同其他社会思潮类似，马克思主义也承受着来自类似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在过去的20年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视野几乎不被承认。事实也是如此，几乎没有学者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夸张地讲，在全国的学术圈中，任何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极端守旧（或知识上落后）。

^① Sitas A, *Voices That Reason: Theoretical Parables*,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 2004, p. 19.

^② Legassick M,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South Africa” (interviewed by Alex Lichtenstein), *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82, 2002, p. 124 - 125.

“峥嵘岁月”中两位白人知识分子——西塔斯与埃迪·韦伯斯特（Eddie Webster）都参与过联盟运动，并对此情势表示了担忧。在后者看来，民主转型“深深地改变了南非社会学研究的环境”，对此，他满怀痛惜地指出：打破种族隔离而建立起来的自由体制竟然会限制独立的学术工作，这实在是相当讽刺的事情。民主制的到来事实上已使关切点发生变更，即从旨在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运动转向了更为技术性的政策导向的研究。^①

7年后，韦伯斯特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指认南非国内持续存在的转变：政府通过施压，迫使南非的这些社会学家们放弃批判的和公共的社会学，而转向关注专业期刊上的发文量以及关于政策导向的研究，并依此牟利，从而使社会学变成一种知识的工具。^②

同样，西塔斯亦带着一丝自责论辩道：当正在进行的转型遇到困难时……当世上最为剧烈的社会实验之一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已失去了创造性回应的能力。而以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为国家的优先战略任务和研究议题时，尽管表现出辉煌的过去，但观念上却又陈腐不堪。^③

南非的学术著作（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根基的丧失，除了受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挫折和地区性社会运动消亡的影响外，还受另外两重深层因素的制约。其一，在追随国际潮流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重组使得学术研究日益商业化，主要表现则是追逐量化的科研产出并使用商业的评价体系。

其二，诚如前文所言，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了高收入的咨询机构、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其中几位已经成为政府支持的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HSRC）的政策研究员。在具有批判力的人文科学落后之时，这些学者才会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如其他国家一般，南非也有一些靠捐赠维系的非政府激进学术团体。这种情况被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统称为知识的工具化，它的关注点从对目的的追问转向了对工具的沉迷。在此，布洛维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种族隔离政府只是将社会学的原则视为制定国家

① Webster E. , “Democratic Transition: South African Sociolog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No. 3, 1997, p. 280.

② Webster E,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ety in Transition*, Vol. 35, No. 1, 2004, p. 35.

③ Sitas A. , “The Waning of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Society in Transition*, 1 (1 - 4), 1997, p. 17.

重建计划的工具，他们完全没有耐心去等待公众或者批判的社会学家厘清不同的社会利益并将它们表达出来。

这种洞见立基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两种公共知识分子——立法者与诠释者——的区分。在布洛维看来，作为立法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服务于政党（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或政府（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他们只享有有限的自主权。而作为诠释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意在建立新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他们往往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疏远。布洛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并未等到后种族隔离时代再去鼓励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激进知识分子，而是确信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就让他们在战斗中扮演诠释者的角色，那么等到国家重建之时他们必定会重回政府的怀抱，继而转变为关注培训和研究政策的立法者。

此即布洛维寻求政府导向型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政治组织或实体（比如说政党）能够洞见公正秩序的全部特征。因而，作为自主、激进的知识分子个人，绝不会单为既定的政治目标服务。政治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妥协，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对于沃尔普，布洛维写到：“同阿尔都塞一样，他希望在自由体制的框架内创造一片可以进行独立建构的理论空间”，而非仅作为一个政党的工作人员存在。当然，沃尔普最后几年的情形显示：打破种族隔离之后，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深党员）对新政府的批评更甚于前，不断质疑政府优先目标，从而引发了关于更深层次社会转型的可能性的广泛论争。

南非马克思主义和北方理论

由柏瑞丽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南非的适用问题，引发了关于“北方理论”在南非乃至全球支配地位问题的讨论。这并非鼎盛时期的南非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独自面对的问题。社会学家肯恩·贾博（Ken Jubber）在追踪南非历史最悠久的开普敦大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后指出。就课程内容而言，开普敦大学更像是一所“不在英国的英国大学”^①。在马克思

^① Jubber K., "Sociology and its Social Context: The Case of the Rise of Marxist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Social Dynamics*, Issue 9, No. 2, 1983, p. 58.

主义到来之前，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是绝大多数南非高校社会学的主导范式。这样的事实表明，北方理论常常影响着20世纪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学界，它既规定着学术议题的内容和结构，又为它们划定界限。

这不仅仅是社会学所面临的状况，南非所有被调查的学术领域——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都以北方理论为中心，这一状况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愈发明显。通过对南非2003~2004年间知识分子的研究，霍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指出：他们不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方面都深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学、殖民史、外围经济体^①、种族隔离政府的策略、转型时期事件、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兴起等，这些都对他们的命运与个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和大都市知识分子的历史二者互相影响，但又绝不融而为一。^②

南非的学者也理解这一点。西塔斯所讨论的“文化适应”问题，其中就涉及借用“文化中心^③产生话语”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时下流行的对北方理论的批判和对发展“南方理论”的呼吁，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北方理论的拒斥与摒弃。在全球共通的社会系统中，这两种知识结构的并存是有可能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按照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观察，大多数学者都开始对在知识与文化上统治地位日渐式微的北方思维进行了反思。问题在于，他们虽然不断强调应建设性地利用北方理论，但对本土(南方的)理论却缄口不言。在重新审视殖民史和反击帝国主义的理论中，理论家们都竭力揭露隐藏在北方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然而，他们都没有寻求用完全对立的“非洲本土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来取代北方知识系统。相反，他们试图认识、理解并超越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会因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只反映北方经验而陷入困境。

任何宣称马克思主义对南非无关紧要(或声称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对南非有害无益)的论断都言过其实了。尽管会偶有不足，但马克思主义依旧会显

^① 外围经济体(Peripheral Economy)通常是相对于核心经济体(Core Economy)而言的，指经济结构单一，过于依赖一种或几种产品(通常是原材料或半成品等)，对核心经济体有很强的依赖关系的经济体，其形成往往与殖民史有关。——译者注

^② Connell R., "The Northern Theory of Globalis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5, No. 4, 2007b, p. 25.

^③ 指西方发达诸国。——译者注

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南非实现了完美结合。尤其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之时，南非马克思主义要求灵活地理解阶级、种族和国家间的关系。

如卡琳尼克思（Callinicos）所说，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始，随着传统理论的崩塌，社会学理论也出现了断裂，各种新的、多元的理论建构方式亦凸现端倪。“新概念的出现”^①，使得社会学理论更加复杂化，也促成了社会学的繁荣局面。通常情况下，这些理论一旦受到北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限定，就无疑会产生普遍的忧虑。这种断裂本身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想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然而，关键是很多讨论“后现代状况”的文献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现实相去甚远。

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从物质劳动形式到非物质劳动形式的转变的探索，也都面临着相同的情形。诸多现代的推理方式（包括那些源自北方的）都和“南方”休戚相关。理论断裂有着普遍的影响，它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知识空间。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自由主义

（一）南非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理论的论战

尽管社会历史学派在南非马克思主义诸流派（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著名的结构主义与还原论中处于弱势，但它却始终致力于处理复杂的国家问题，尤其是南非国内的种族和阶级问题。已有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研究文献已然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历史学派在解决国家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

在南非，以阶级、种族和国家为主题的文献一开始就涉入普朗特赛因斯和国家起源论者之间的争论，并逐步确认资本的內部冲突或资本与劳工的斗争是种族隔离的造就者。人们很快便发现这一论争在内容上是极为有限的。尽管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保持着普遍关注，对国家形式问题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但对国家本质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这些理论中，政府犹如一个“黑匣子”：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将要素“输入”到南非政府，尔后再通过“输

^① Elliott A. and Ray L. eds, *Key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st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p. xi.

出”来显现。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全然没有对于输入和输出这两种转变及其关系的解释。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克服上述缺陷，但未必都能成功。这一工作牵涉面较广，利益团体、机构、政府官员观念、政府内部斗争、政策形成与执行过程等等都包含在内。这种关于国家和官僚机构的韦伯主义的忧虑，将政府（本身）视作调查和概念化的“客体”，它对于充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要求从南非的社会现实着手，去理解国家在社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因而带有实用主义和还原论之意。因此，国家总会被指责代表了资本的利益。

一批关于国家利益和国内斗争的文献对上述状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政治学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种族和国家》一书中，着重探讨了种族隔离国家的利益问题。他认为，种族隔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白人资本家服务的，因为政府的发展有赖于他们的支持。广而言之，“（政府官员的）命运、身份和意识形态与（隔离的）种族秩序的存续密切相关”。^①不出所料，一切破坏种族秩序的活动在70年代都受到无情地打击。在格林伯格看来，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仍旧是概念化的，资本和国家间的关系纯属历史的偶然。

布洛维在1982年指出，南非的国家理论要得以发展，就必须摒弃主体与客体概念的界定，并发展出一组具有特定意义的国家概念体系。为此，沃尔普将国家界定为一个“矛盾和冲突的复杂集合体”^②。这一说法消解了纯粹的国家利益观念。国家本身并不讲求利益，国内的团体（纵向是指各种组织机构，横向来看则指管理层）才讲求利益。欧·米拉（Dan O'Meara）辩称，国家本就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它并不在阶级斗争（包括当时处于统治阶层的布尔人内部的斗争）之外。例如，在约翰·福斯特^③总理任期内（1966~1978年），“南非国民党内部宗派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政府部门间的争端也是如

^① Greenberg S, *Race and State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Wolpe H,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No. 8, 1980, p. 419.

^③ 巴尔塔扎·约翰尼斯·福斯特（Balthazar Johannes Vorster），在任南非共和国总理期间（1966-1978年），全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译者注

此”。^① 其后，博塔总统^②改组政府机构，试图削弱极右派（保守派）与开明派（现代派）做出的改革努力的对抗。这种对抗导致政府角色越来越边缘化。

虽然上述文献的著述风格极富吸引力，但却免不了陷入将国家利益降格为阶级利益，国内斗争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结局。这些文献的缺陷在于，缺乏一个总体而连贯的理论框架，以便对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非还原论和非实用主义的阐释。大卫·尤德尔曼（David Yudelman）的书——《现代南非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 Africa*, 1983），提到一种关于国家和资本间的共生的（或权力共享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的相互依存的”^③。对他来说，资本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利益和权力。他运用共生框架对1902~1939年的金矿公司进行了分析，矿业资本家和政府都对白人劳工和受剥削的黑人劳工进行过混编。这表明国家在推行特定的政策和项目时，必须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坚持自己的原则。

毫无疑问，对秉持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些理论对矫正对种族隔离国家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将各种理论并入一个更加广博与灵活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此即约翰斯通所言“开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识。

（二）南非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转变

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兴起表明，在后种族隔离的前景下，将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纳入其中具有一定光明的前景。诚如前文所言，理论断裂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打开了古典无政府主义和内在激进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定型中的南非以及南非政府尤为重要。在南非，国家与政府的定型被认为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社会转型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础。同时，南非共产党聚集了一批托派知识分子和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一种以自治主义形式存在的非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霍洛韦的消极自治主义——它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

① O' Meara D, *Volkskapitalisme*, Braamfontein: Ravan Press, 1983, p. 252.

② 彼得·威廉·博塔（Pieter Willem Botha, 1916—2006），他在任南非总理期间推行宪法改革，并于1978年至1989年间任总统，是最后一个种族隔离时期的总统。

③ Yudelman D, “Capital, Capitalists and Power in South Africa: Some Zero - sum Fallacies”, *Social Dynamics* Issue 6, No. 2, 1980, p. 67.

我们相信，自治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重获新生意义重大。

基于对南墨西哥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特征的理解，霍洛韦提出了一种以变革社会为中心的理论，它提倡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二元对立。与之相对应，国家中心论则认为，权力须高度集中，且只能由国家把控。自然，它对资本凝聚力的基础，即日常拜物教中展现出的社会关系是视而不见的。现代国家形式是经过经济与政治的历史性分离之后才出现的，其中，政治并非一股解放的力量，而是一种压迫。所以，在资本主义戏剧性地（或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后，其目的昭然若揭。这些，正如我们预言过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都发生了。

霍洛韦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事实上，以一系列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国家，本身就充满斗争。其实，霍洛韦早就熟知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起源论以及国家处处是斗争的观点。正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变革而让渡权力是国家分内之事。而在霍氏的语境中，真正的解放力量深藏于活跃的公民社会中，社会转型预示着想象的政治和间质性的变革，资本主义的裂纹终将被“自治的”政治不断撬动和推开。

这一思路，深受经典无政府主义和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融合”——的影响。在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影响下，全球范围内的局部斗争将不会间断。同时，还有一批像巴迪欧一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受1968年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影响，依旧强调反集权政治之于真正解放的意义。

这种不乏批评意见的理论，对后种族隔离社会的大众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德班窝棚居民运动）。曾在南非任教的社会学家弗兰克·巴切尔斯（Franco Barchiesi）指出，“南非所建构‘左’的（即以国家为中心）思想已消退”，这将昭示着追求激进民众自治政治的美好前景，这种自治政治寻求恢复对地方空间的掌控，使之摆脱旧式的先锋政治。这种形式的政治并未与国家相分离，事实上，它有可能通过正规的法律程序在国家的体制内运作。然而，它的终极目标是寻求在国家体制及其规范之外的运作，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政治，什么不是政治。

政治自治论不单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现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

内的反种族隔离组织都是围绕着国家中心的斗争和国家权力的争夺而发展起来的，同时，还有一种寻求以预期的方式建立新社会的反集权的路线。前文提及的联合民主阵线所属城市的街道办就是现实的例证，对于保守的社会力量而言，它也是一种威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使国家权力得以巩固，既没有维持也没有推进社会动员；实际上，它已控制了存在于政党结构外的一切以社区为基础的政治形式。同样地，如钱斯（Chance）描述的有关窝棚居民运动及其成员的情况所揭示的，现在的自治运动已经从属于抵抗运动，并且受到政府的直接镇压。

纳什认为，我们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南非的衰落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苏维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分歧并未完全消除，二者是“根本异质性的哲学”^①。其实，就马克思主义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衰落而言，情况远比纳什预想的复杂。然而，如邦德、德赛和里格斯科等高调的托派知识分子依旧活跃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可以说，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南非已经衰落，但托派不仅存在于学术机构^②、非政府主义中，还部分地存在于抗争的群众——包括很有影响力的艾滋病运动治疗行动阵线（TAC）和反私有化论坛（APF）^③——之中。

南非的托派分子以国家为中心，并展开对社会历史学派的批评。这就决定了它处于社会历史派和自治主义之间的特殊位置。因而，德赛批评道，“南非理论界毫无生气……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持的社会历史论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他们只想简单地记录穷人的声音”^④。不可否认，这种评价对社会历史学家（和当前年轻一代的激进自由论者）工作的贬抑有些夸张。他们工作的

① Nash A, “The Moment of Western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19, No. 1, 1999, p. 79.

② Ngwane T., Bond P and Desai A., Uneven and Combined Marxism within South Africa’s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2014-11-25>.

③ 运动治疗行动阵线（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TAC）建立于 1998 年，这一组织给南非政府施压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研制和提供有效和负担得起的抗逆转病毒药物。反私有化论坛（Anti-Privatisation Forum, APF），是围绕着基于工作和基于社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诸如水电服务的私有化等问题而于 2000 年建立的。

④ Lee C., Sovereignty, “Neoliberalism, and the Postdiasporic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 A Conversation about South Africa with Patrick Bond, Ashwin Desai and Molefi Mafereka ka Ndlovu”, *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2009, p. 154.

理论基础是关于边缘群体^①的理论，重新激活了这样的认知：日常生活和经验与社会政治活动并非处于不同的实践空间，而是处于同一个连续的复杂社会过程之中。

结 论

南非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现实中带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倾向，虽然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由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及其种族主义主张给这一理论带来了挑战，但是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国家形式本身及其座架的逻辑与合理性。正如自治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自由主义传统所主张的，南非马克思主义需以全新的视阈示人。更多的自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将有助于确认理想政治的重要性，并且有助于强化对新的人道主义的需求。这里所说的新人道主义既是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失望中产生的，也是在种族隔离的痛苦经历中生发的。然而，要实现这一想法，则必须追求一种讲求尊严的政治，而非单纯地进行重新分配的政治。

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许多学派的共同的鲜明特征就是人道主义。在南非，任何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方案都必须和法农所言的人道主义相符。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在《帝国》（*Empire*, 2000）一书中区分了先验的人道主义（通常是先锋政治组织所宣扬的）和源于日常经验和特定的、多样化斗争的人道主义。后者并不需要明确区分集权政治和反集权政治，因为它们是一事物的两端，二者相互关联、辩证存在，且从未以任何纯粹的形式存在。例如，现代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的辩证特征就暗示着同时需要集权的和非集权的自治政治路线。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革命政党，如果恪守规范或者能够以民主的方式掌控权力要素，他们的精神是可以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留下烙印的。然而，这并不会破坏间质性的革命过程，这一过程会削弱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凝聚力，同时，南非所急需的也正是以理想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新人道主义。

^① 边缘群体（Subaltern Peoples），在批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指在社会、政治、地理等方面处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社会群体。——译者注

The Main Schools and the Thoughts of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Kirk Helliker & [*South Africa*] Peter Vale

Abstract: Marxism is an important fundamental theory for South African people to achieve freedom. Profiting from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practice,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boomed and appeared as two academic schools,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However,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 - Apartheid period, Cold War mentality, arguments on state theory and the expansion of liberalism, the critical power of Marxism declined little by little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met great challenges. Lying on South African social history conditions and lots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pla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South African Marxism honestly and to find a new kind of humanism fitful for South Africa.

Key Words: Marxism in South Africa; Neo - liberalism; Social Transformation; Autonomist Politics

(付文军 张晓辉* 编译)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 本文编译者付文军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张晓辉供职于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